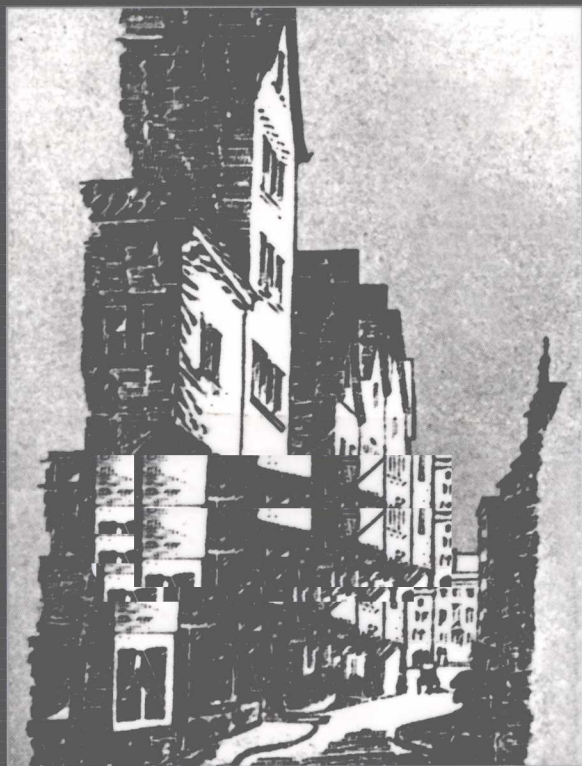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Comment Vivre Ensemble

Cours et Séminair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1977)

如何共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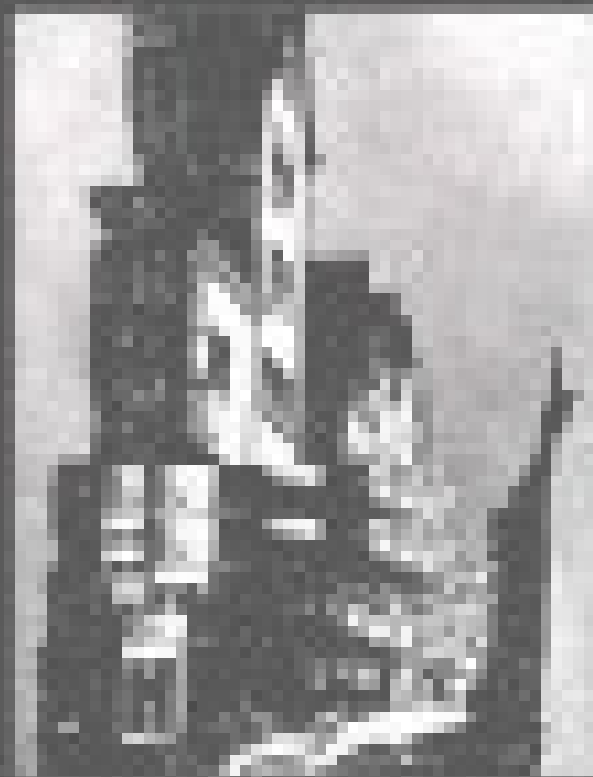
法兰西学院课程和研究班讲义 (1976—1977)

[法]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兰·巴尔特文集



罗兰·巴尔特文集

罗兰·巴尔特文集

（法）罗兰·巴尔特著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Comment Vivre Ensemble
Simulations Romanesques de Quelques Espaces Quotidiens
Cours et Séminaires de l'École de France (1976-1977)

如何共同生活

某些日常空间的故事性模拟

法兰西学院课程和研究班讲义 (1976—197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何共同生活/ (法) 巴尔特著; (法) 科斯特文本整理、注释、作序; 怀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12229-8

I. ①如…

II. ①巴…②科…③怀…

III. ①宗教社会学-研究②语言学-研究

IV. ①B920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2938 号

罗兰·巴尔特文集

如何共同生活

——某些日常空间的故事性模拟

法兰西学院课程和研究班讲义 (1976—1977)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克洛德·科斯特 文本整理、注释、作序

怀宇 译

Ruhe Gongtong Shengh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0.875 插页 3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0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

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柯）。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柯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20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

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需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20世纪特别是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①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

① 在“10卷12部作品”之后，已经获得版权的巴尔特作品有：《萨德·傅立叶·罗犹拉》（1971）、《明室》（1979）、《中国行日记》（1974）、《哀悼日记》（1977—1979）、《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恋人絮语》（1974—1976），并有附卷《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Hervé Algalarrondo著）。——编者注

学院就职讲演 (1977): 李幼蒸

2. 米什莱 (1954): 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 (1964): 张智庭 (怀宇)

4. 埃菲尔铁塔 (1964): 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 (1964): 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 (1985): 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 (1976): 张智庭 (怀宇)

8. 如何共同生活 (讲演集 1) (2002): 张智庭 (怀宇)

9. 中性 (讲演集 2) (2002): 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 (讲演集 3): 李幼蒸

附卷: 罗兰·巴尔特传: 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 (Eric Marty) 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 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 5 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 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 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 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 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 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 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 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 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 (笔名怀宇) 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 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 1988 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 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 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 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 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

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于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 and 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书写的痕迹”丛书主编序^①

“当有人问瓦莱里^②为什么不出版他在法兰西学院^③（Collège de France）的讲义时，他回答说，形式是珍贵的。不过，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即资产阶级写作盛行的时期，形式差不多与思想价值等量齐观。”巴尔特先是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于1950年11月16日《战斗》（*Combat*）杂志上的《风格的手工

① 本篇为法文版原书文前所附“书写的痕迹”丛书主编序。这套丛书以著名学者的讲义为出版对象，其中包括罗兰·巴尔特的《中性》、《如何共同生活》和《小说的准备》（上、下册）。

② 瓦莱里（Paul Ambroise Valéry，1871—1945）：法国诗人、作家、批评家。——译者注

③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又译法兰西公学，创立于1530年，是法国历史悠久、学科齐全的著名高等讲学学府。其特点是开设公共免费课程，有50个左右的教授作讲座，不举行考试，也不发文凭。——译者注

艺性》(L'artisanat du style)一文,就是以这行文字开始的,后来,该文收入了《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一书。

当时,巴尔特正在时近时远地与萨特^①和布朗绍^②一起认真思考一种文学伦理学的可能性。这种伦理学既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有关形式的一种职责。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有一天能当上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而且出版其讲义的问题也会出现,但是,通过他引述的瓦莱里的话,我们明显地看出,对于他来讲,需要建立的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伦理学,而不是为其同代人制定一种道德公约。这种伦理学,远不是各项规定的一种名单,或者是它们的一种汇聚状态。因为,它不止于以智力介入为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风格公约。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从来就没有最终的遗愿。而当一位作家出于天真或内疚于最后时刻认为该留下一些后话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为了让别人违背这些后话,情况总是这样。于是,出版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讲义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出版某种遗嘱,也没有想到是对于死者的一种深切忠诚,而是很想按照作品和引导作品的思想以及曾经是其对象和保护者的伦理学的总体逻辑来进行出版。因此,在我们的思考开始之际,我们想起有关瓦莱里的话是很自然的,这句话使年轻时的巴尔特成了去世后的巴尔特的真正缩影。

这种出版物首要的和几乎是一种公理性的原则,是法兰西学院讲义不可以也不应该被看作书籍。

因此,有两种假设便一下子被避开了:一是重写这些讲义,这种重写要确保其具有写作产品的外表;二是以印刷的方式誊写当时

① 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哲学家、小说家。——译者注

② 布朗绍(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法国作家。——译者注

录制下来的口语表述，而这样做很可能会制造伪作品。

每一种假设都有自己的逻辑。我们很清楚使我们摆脱第一种假设的东西是什么。由一位弟子来复述大师的论说，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与合理性。这种特殊情况是指在大师去世之后，或者为弥补其生前不肯出版著述的缺憾及为一种深奥的学说增加一种可能的阐释空间，或者就是通过将学说讯息铺展成一套丛书来使弟子们与读者之间建立起联系。显然，这样的一种计划对于巴尔特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一位著书立说之人，教学活动是他的一种世俗性的和非业内的实践，而且，他的诸多书籍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他认为必须传达的基本内容。此外，在巴尔特有意将某次报告会的内容转换成书籍的情况下〔《S/Z》（S/Z），《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这种书籍无论如何都不是讲义的延长性书写，而是一种全新的对象^①。

拒绝第二种假设，即拒绝誊写课上的口语表述，有着其他更为深刻的合理性。这些合理性是由巴尔特自己提供的，它们涉及言语与被写出的东西之间关系的问题，即涉及作品的民族习性（*éthos*）问题。巴尔特在年轻时（1959）的有关一次新小说讨论会出版物的文章中写道：

且不说作家在说话（例如在电台上）时人们总可以从他说话的节奏、从他发音的方式了解到某种东西，单说这种言语随后转换成书写形式这一点，就好像言语活动的秩序和本质是无关紧要似的……这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在产生一种混合的和无意蕴的书写，这种书写与被写的东西之间既无明显距离，又与被说的东西之间无诗学压力。总之，任何圆桌会议都是从作家最好的方面提

① 巴尔特以《恋人絮语》（Paris, Seuil, 1977）为例对“研究班讲义”与书籍的区分做了说明，对于这本书，当他在课上讲授共同生活的时候，某些听课的人已经预感到某种形式的失望：“有关恋人话语的书也许比研究班讲义更贫乏，但是我认为书籍更为真实。”

取其最坏的言语：话语。然而，言语与书写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可相互结合，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只不过像是一种对立的某种东西：书写是由对于所有其他言语活动的拒绝来构成的。^①

的确，一种宣读过的讲义，不会像一次圆桌会议上讲过的话那样空洞。不过，它自身也带有言语的命定特质，这包括其意外变化、其瞬间的和过渡性的特征、其不可逆转的连续性、其自己词语的明显的语流——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语流对立于是写出的东西，而写出的东西则是不得不写的、有范围的、循环重复的、延续和流动的、间断和适度的。还有，甚至就在这些对立之处、就在铸成印刷品的任何言语赖以形成的陈词滥调之处，有着巴尔特据以确定书写的东西：“书写，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矛盾，它使一种交际的失败变成一种二级交际，即变为对于别人的言语，而这种言语又是无他人的。”^②

放弃重写巴尔特讲义和放弃“改写性”誊写这两种假设，不只是属于巴尔特有关书籍学说的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两种假设之所以被排除，也是根据这些讲义的性质、根据它们在巴尔特智力行程中具体的和特殊的地位来确定的。

显然，书写生产与教学实践之间的差异，因1977年进入法兰西学院而变得突出了。因为，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从前，当巴尔特主持局限于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研究班的时候，如果说他那时可以考虑将这样或那样的讲义转换成书籍的话，那么，在他来到法兰西学院之后，这种假设就完全消失了，因为在这所公学里，昔日那种苏格拉底式的聚会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激发对于永久性权威言语的欲望。

巴尔特认为，在法兰西学院里的那些讲义，不再有任何可以明

① 《圆桌会议》，见《全集》卷一，*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Ed. du Seuil, 1993, p. 803（后面简写为OCI, 803）。

② 同上书，802页。

显地奠基其思想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属于其著述谱系的东西。这种情况大概也与巴尔特所经历的个人转换时代有关系。

我们将不对这种情形进行评论，而只是提醒注意，巴尔特在这样或那样讲义的转折处说明了他个人的话语似乎正被去理论化并因而使听众大失所望的原因：“我们正处在知识分子‘使命’的一种活跃的‘健康’解构阶段。这种解构可以采取一种后退的形式，但也可以采取一种干扰的形式、一系列分散肯定的形式。”他后来在关于中性的讲义中又补充说：“以致力于建立协调的一种知识（也许是驱而不散的知识：物象化、编目）来替代一种观念斗争的享乐”。

实际上，这些讲义的特点使任何装扮都变得矫揉造作。任何想使讲义获得作品外表的重写考虑，任何赋予讲义（就像在一种假象中那样）以书籍表现力的誊写做法，如果我们敢用一个词语来说的话，那就是对于讲义之对象的几乎是系统的某种审慎陈述（under-statement）。这种实践有时甚至给人以这些授课只不过就是宣读工作卡片的印象。

讲义本身的结构，不是依据一种话语的展开来组织的，也不是依据一种逻辑或一种思想来组织的，而是依据巴尔特叫做随字母顺序或随机数学^①的排列特征（traité）来组织的。这种结构旨在彻底地于话题上中止任何学说的功能。于是，在这些年中，讲义便按照我们说过的顺序，即无顺序，使一些在篇幅和重要性上不等的“章节”相续排列开来，这些“章节”就是那些长短不一的“卡片”。那些卡片或多或少是百科全书式的、或多或少是个人的，都是在讲

① 字母顺序被选用在了“共同生活”上，随机数学顺序被选用在了“中性”上。只有关于“小说的准备”的课程表面上服从了话语的礼仪，但却是以小说准备的“模拟形式”出现的。请参考安托万·孔帕尼奥（Antoine Compagnon）就此发表的看法，《罗兰·巴尔特的小说》（*Le Roman de Roland Barthes*），见于《想象之书》（*Le Livre imaginaire*），《色里兹研讨会文件》（*Actes du Colloque de Cerisy*），2002年秋季号《人文科学杂志》（*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义对象所开发的知识领域启发下制作的：这些领域便是“共同生活”、“中性”和“小说的准备”。

在巴尔特身上，有着某种似乎矛盾的双重运动。一方面，是讲授课程的愿望，即主动讲授由于对一种知识领域的积极探索可能产生的有点艰难而令人厌烦的一切东西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拒绝开发这种知识，即拒绝将其发展成属于个人的一种现象学，就像他过去所实践的那样。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讲义可能显得叫人失望。

这种失望，不仅被巴尔特所预见，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所希望的。很显然，不应该以通常的方式来构想这种失望观念，而应在完全是巴尔特式的情况之下，按照一种阈学^①即一种有关程度的科学来构想。我们知道，巴尔特曾为纪德^②总结了一句深刻的话，根据这句话，甚至神仙都不会将其当作箴言：“我令人失望。”这就是说，借助于这一讽喻，失望具有不少美德，并且不应被庸俗地理解为衰弱的表现。它至少属于把我们安排在不可推断事物之中的一种效果辩证法。

此外，这种失望还有其他的显现动因，甚至包括讲义的主题，而这一点在“共同生活”上则是很明显的。对于这一课程的隐蔽的问题，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概括：“个人节奏群体是可能的吗？可能会有一个既没有目的（Télos）又没有原因的共同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

① 阈学（bathmologie），这是巴尔特自己发明的一个词。该词词根“bathmo”指的是有关的事物和特性，尾缀“logie”指有关某一方面的科学。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有关阈的科学”。“阈”在汉语中指“门槛儿、界限、范围”。巴尔特解释说：“任何话语都处于等级游戏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游戏称之为：阈学”（《罗兰·巴尔特自述》，*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Seuil, 1975, p. 71）。——译者注

② 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法国作家。——译者注

束——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没有顺序——的话题，所以，这种否定便一直就有，就好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取消这种研究对象的本身那样。实际上，这样一来，这种否定性就好像是课程的真正对象，就好像是其真实性。

照此理由，我们可以认真思考整个的处理区别。许多知识分子作品^①中烫手的共同体问题，在巴尔特对其进行否定性解构时变成了这种处理的对象。这样，我们便可以推想在巴尔特那里成为某种悖论方法的古怪的否定性。这不只是一种方法，它还是一种苦行。从这种苦行中，可以解读出对于思想的零度、思想的中止和思想的狭小角度的某种无声的靠近，而在这种思想中，言语似乎可以躲避知识分子的诸多特定的神秘化（即异化）形式：本领的神秘化、说服力的神秘化、“理论”的神秘化、诱惑力的异化、控制和冲突的异化。在巴尔特几乎从不谈及的这种状态下，有着摆脱某位个人的总是有话要说的大学教学话语或知识分子话语领域的一种方式，试图一声不吭地占据一位审慎主体已经变动了的位置，而这位主体则表面地、简单地满足于指明一些知识领域，满足于圈定、划分、罗列一些可能的资料，满足于产生其对象的某种语文学转向。而这种摆脱和变动，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就存在于对课上那些无联系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片段按照字母或数学的任意性所做的无意义的杂乱排列之中。

不论怎样，如果失望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法兰西学院讲义的对象、形式、礼仪和细节本身不可分离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想到，这种失望触及授课的行为本身。对于这种行为，巴尔特显然不再有任何期待。

讲课是一种生产，它只有在被大声地说出去的时候才有目的和存在性。巴尔特在有关中性的第一讲中说过一句话，确切地点明了这一点，他说：“必须坚持用13周时间来听完这些难以忍受的内容：随后，这些内容都将化为乌有。”

① 例如布朗绍、阿冈班（Aganben）、南希（Nancy）等。